

冷战国际史研究系列丛书

“一边倒”是基于当时两大阵营公开对抗的冷战形势，作为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做出的一种政治选择。“另起炉灶”是为彰显自身革命的正当性和彻底实现民族独立与平等，所采取的外交策略。

多维视角下的 亚洲冷战

COLD WAR



主编 崔丕 [日] 青山瑠妙



世界出版 出版社

冷战国际史研究系列丛书

多维视角下的亚洲冷战

崔丕 [日] 青山瑠妙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多维视角下的亚洲冷战/崔丕, (日) 青山瑠妙主编.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 - 7 - 5012 - 4715 - 8

I. ①多… II. ①崔… ②青… III. ①冷战—国际关系史—文集 IV. ①D81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79756 号

责任编辑 罗养毅
责任出版 刘 喆
责任校对 马莉娜
封面设计 嘉 维

书 名 多维视角下的亚洲冷战
Duowei Shijiao Xia De Yazhou Lengzhan

主 编 崔丕 [日] 青山瑠妙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电 话 010 - 65265923 (发行) 010 - 85119023 (邮购)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980 × 680 毫米 1/16 22¼ 印张
字 数 36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4 年 8 月第一版 2014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12 - 4715 - 8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冷战国际史研究系列”编委会

主 编

李丹慧

编 委（以姓氏拼音排序）

白建才	蔡佳禾	陈 兼	崔 丕	戴超武
邓 峰	黄民兴	李丹慧	刘晓原	罗养毅
牛大勇	牛 军	沈志华	王晓德	夏亚峰
徐 蓝	徐思彦	杨奎松	于 群	余伟民
翟 强	张小明	张曙光	章百家	赵学功

“冷战国际史研究系列”丛书

总 序

在历史研究中，冷战国际史研究不仅着眼于国际间的双边或多边关系，而且还在这一基础上向外扩展，探讨某一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军事格局的形成和走向；向内延伸，分析在已经形成的世界格局中各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影响。故而，就此意义上说，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于国际关系史范畴的新的研究领域。

冷战国际史区别于国际关系史的重要特征即在于它的国际性，它是一个国际史。所谓“国际史”，其含义有两个层面，其一在于，无论是学者队伍和史料来源，还是研究对象和观察视角，凡在冷战史的范围内，都不能再以某一个或几个国家为中心，而已经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其二则在于，冷战首先表现为以意识形态、制度为分野的分庭抗礼，不同制度的国家卷入其中，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国际斗争，由此引发美苏集团对各地区、民族或国家事务的卷入，除阵营国家外，处于中间地带的各民族国家多分别依附于一方，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与两极国际格局的演变已经融为一体。这种历史现象的内伸与外延，已不是一般的国际关系史所能囊括的了。

1991年，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两德统一为标志，冷战作为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时代结束了。即之，以俄国档案的解密为契机，一系列前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档案也纷纷见诸于世，加上原有的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定期公开的档案，学者们可以通过大量的一手材料更加真实地描述和解释冷战时期的历史。所有这些构成了冷战史研究在1990年代异军突起的时代机遇。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于1991年率先成立了

冷战国际史项目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许多国家和地区也随之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或团队。此后, “冷战国际史”这一概念便开始流行, 并被国际学界广为接受。

当 20 世纪中叶开始的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相互对抗成为过去后, 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也即逐渐拉开, 各国冷战史学者得以在摆脱冷战环境及其思维定式束缚的条件下, 对冷战的概念、内涵和外延, 冷战的起源, 冷战思维对各国决策层的影响, 大国关系对国际政治力量改组的影响, 小国在冷战格局变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不同阵营内部关系的变化及其对两极格局的影响, 美苏之间冲突、遏制、对抗和缓和的交替过程, 苏联解体过程中的冷战因素, 冷战框架和冷战思维对后冷战时期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影响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 进行比较客观的再思考。由此, 国际学术界掀起了对冷战历史研究的新的热潮, 参与学者的人数和国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课题的种类和范围以及档案文献资料所涉及的语种和国家等等, 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几十年的研究状态。这种新的国际学术潮流, 被国际著名冷战史专家约翰·路易斯·盖迪斯 (John Lewis Gaddis) 称为“新冷战史” (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近些年来, 冷战国际史的新研究日渐深入, 其主要学术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众多冷战史研究群构成了国际学者队伍。在美国和西欧, 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位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冷战研究项目、以瑞士联邦技术学院安全研究中心为依托的合作安全平行历史项目 (The 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on Cooperative Security) 等, 是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冷战史研究中心; 此外还有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冷战史研究中心, 法国的“欧洲认同、国际关系和欧洲文明”研究所等冷战研究机构。而中东欧各国也几乎都建立了冷战史研究机构, 除俄罗斯科学院冷战史研究中心外, 经常在国际学界露面的是匈牙利冷战史研究中心和保加利亚冷战研究组。在亚洲, 比较活跃的有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 以及日本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韩国参与冷战史研究的主要是韩战研究会和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新加坡国立大学近年也成立了冷战研究中心, 侧重于冷战在东南亚的历史研究。香港大学历史系的美国研究中心经常与各国冷战中心合作

举办国际会议，是亚洲冷战研究的主力之一。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组建了一个专门研究冷战时期海峡两岸关系的研究群，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也有冷战史研究小组。印度学者最近也开始加入冷战史的研究队伍。

2. 档案开放、收集的国际化与多国档案的综合利用。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须以第一手的档案文献构成学术论著的叙述主体，不仅如此，这项研究还强调综合利用双边档案或多国档案从事学术考察。以往的冷战史研究，依靠的主要是美国档案，故形成“美国中心论”——冷战史实际上是美国外交史——在所难免。目前，各国档案的开放、收集、整理、翻译及综合利用，已经成为冷战史研究领域首先关注的事情。正是这种档案收集和利用的国际化趋势，从根本上突破了“美国中心主义”倾向，使冷战史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冷战国际史研究。

3. 研究者学术关怀的重点集中在历史事实的重建。冷战国际史之所以被称为“新冷战史”或“冷战史新研究”，并不是因为研究者持有相同的、统一的观点，更不在于他们形成了一个学术流派，而是恰恰相反，学者之间在很多观念、概念、定义以及对史料的解读方面，往往存在不同的释义和看法。就学术关怀而言，研究者的共同努力首先和重点在于重新描述历史过程，重新构建历史事实。冷战时代结束后，世界现代史在基本史实的认定方面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过去，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档案文献的阙如，冷战双方的研究者无法看到或不想看到铁幕的另一边究竟发生了什么，学者眼中的历史常常是片面的、虚假的、错误的，甚至是扭曲或被歪曲的。如今，随着对峙双方档案文献的解密和公布，以及学术研究中意识形态因素的弱化，冷战历史的原貌开始浮出水面。冷战史演进的全过程进入重建阶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各国学者首要的和主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4. 档案交流和专题研究方面的国际合作日益加强。冷战史研究走向国际化的趋势，是冷战结束以来各国档案大规模开放的现实促成的，也是其研究领域本身的内涵所决定的。冷战史研究领域的重大专题研讨会，需要多国学者利用多国档案共同参与讨论，如此才能更有效地辨明事实真相，总结历史教训。

5. 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目前,在持续关注冷战起源、苏联与冷战的关系、中美和中苏关系、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诸多热点问题的同时,冷战史学者也开始走出大国关系史研究的光环,注重考察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区的互动关系。从战后基本同步、并列延伸的冷战和殖民主义瓦解的进程来看,冷战的发展实际超出了东西方对抗的范畴,成为一种更为复杂、更具多元化特征的历史过程。两个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地区争斗的日益激烈,使得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中的冷战对峙和民族独立运动这两大历史脉络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冷战的规模由此拓展至全球。这期间,第三世界扮演的角色不容忽略。只有进一步考察第三世界国家在冷战中的地位和影响,才能使人们更加深刻而全面地了解冷战年代世界格局的内涵,以及在这一总体格局中各国历史的发展道路。此外,冷战国际史研究还进一步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范畴,把观察的视野转向经济、文化和一系列社会问题,“经济冷战”、“文化冷战”、“宣传战—心理战”等研究逐渐兴起,跨学科研究成为一种发展趋向。战后以来,经济、文化、科技、宗教、社会等各类专门史,都不可能摆脱开冷战这个核心;与此相应,研究冷战史,研究国际格局产生和变化的过程,也必须考察经济、文化、科技、宗教、社会等问题,因为正是这些问题与国际关系问题融合在一起,才构成了冷战时代本身。也只有运用多维视角,才能完全展现出冷战史作为一部国际史的价值和魅力。而就方法论言之,一些学者正尝试着在合理的新历史证据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冷战国际史概念、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式。而这种做法本来就是冷战国际史研究者所关注的,重新建构历史活动之中的应有之意。

作为冷战中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角色和作用 is 冷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的发展轨迹与冷战进程交织在一起。以此,中国学者在冷战史新研究兴起之初就参与到了这一学术潮流中。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正日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在朝鲜战争、中苏关系、新中国对外政策、台海危机、越南战争等一系列冷战史重大课题的研究中,许多中国学者的观点及其所依据的史料都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已经进入国际学术前沿,具备了与国际一流学者对话的能力。因此,与其他学科稍有不同的是,中国的冷战史学科一开始就是与国际学术界保持同步的,目前冷战史

学界的新趋势也是贯穿在中国冷战史学科发展之中的。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其作为中国学术界新兴学科的地位也已经确立起来。

不过，中国学者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仍然存在着某些不足和需要改进之处。其一，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仍然是中国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大宗产品”，从事其他方面研究的学者比例过低。其二，多国多边档案的互证对比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三，偏重政治、外交和军事史研究，对社会、科学、经济和文化方面冷战的研究尚嫌重视不够。在中国日益崛起的今天，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还须迈出更为坚实的步伐，学者们的视野应该不断“扩张”，探索也应该“面面俱到”。毕竟冷战的历史极其丰富和鲜活，队伍庞大的中国的研究者应当尽可能均衡地关怀和揭示冷战史的方方面面。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发展的要求。

近年来，“新冷战（New Cold War）”问题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大国之间围绕利益和权力展开的对抗，国际政治中出现的对峙和遏制，似乎重演着冷战年代的是是非非。面对新产生的“世界是否会进入新冷战时代”、“目前国际紧张状态中有哪些因素来自于冷战年代”、“国际局势今后将如何发展和演变”等问题，人们只有通过思考过去的经验教训，才能做出合乎逻辑的解答。由于当代世界的结构性因素和重大国际问题的渊源都与冷战时期密切相关，所以，冷战史研究可以为理解和把握后冷战时期的历史运动规律、应对及管理现实的国际危机，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和战略性评估。这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入地加强冷战国际史研究，并在学科建设方面将这一研究提高到应有地位的现实意义所在。

有鉴于此，为了推动中国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继续拓展和深入，促进中国现代史、世界现代史、现代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发展，以及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选择对外方针提供政策咨询，我们着手编辑并出版了“冷战国际史研究系列”丛书。此套丛书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既有中国学者的最新专题研究成果，也有国外学者的冷战史研究新作以及口述历史著作。该套丛书将持续编辑出版下去，以期集中反映中外学者冷战史研究的面貌，拓宽中国冷战史学者的思路，开掘冷战史研究的新材料。

我们相信，经过中国学者的努力，中国的冷战国际史学科，必将

不断走向成熟；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也必将以其客观、严谨、厚重、创新的学术品质，跻身于世界史林。

“冷战国际史研究系列”编委会

目 录

毛泽东时期中国外交论

——以中苏同盟为事例	毛里和子	1
被迫的联盟：斯大林与中共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沈志华	12
围绕着中国委员会的同盟政治与日本	山本武彦	35
冷战转型期的美日关系：对“东芝事件”的历史考察	崔 丕	62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之经线	牛 军	91
冷战背景下新中国政府清除美国文化影响的经过	杨奎松	112
关于1950—1970 年代中越关系的几个问题		
——对越南谈越中关系文件的评析	李丹慧	134
第三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与美国的反应	增田弘	168
美国、台湾与朝鲜战争	赵学功	198
被忽视的角色：英国与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战俘遣返问题	徐友珍	229
“战后”秩序中的中苏同盟（1945 年）	松村史纪	249
互惠与国际协调：亚洲冷战融解进程中的中日关系	徐显芬	270
国民党军残部在滇缅边境的活动与第一次撤退台湾始末 （1950—1954）	张绍铎	291

试论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美国对台海危机决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第二次台海危机为例 周 娜 310

“青瓦台事件”、“普韦布洛”号危机与美韩关系 梁 志 324

毛泽东时期中国外交论

——以中苏同盟为事例

毛里和子*

一、中国外交六十年——时期区分

在纵观近六十年的中国外交时，中国的国际政治学者大多是以与敌友的战略关系为主轴来观察这六十年的变化并进行时期区分的。例如，1990年代末，喜好现实主义手法的张小明（北京大学）就大致以十年为期把五十年划分为四个时期：^①

第一期（1949—1959年）：向苏“一边倒”时期

第二期（1960年代）：以美苏为敌时期（两条线时期）

第三期（1970年代—1980年代初）：以苏联为主要敌人时期（一条线时期）

第四期（1982年以后—）：不设敌友，独立自主时期

按照这个分类法，或许可以把1992年以后划为第五期，即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自立时期。

* 毛里和子，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顾问教授。

① 张小明：《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四次对外战略决策》，《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5期。

又如，庞中英（中国人民大学）认为决定建国后六十年间中国外交的因素第一是内政，第二是国际大环境（如冷战的两极结构等）。他分析，中国外交一直是以下列三大原则来应对这两个决定中国外交的因素的。第一，内政与外交不可分割的原则（外交为内政服务）；第二，对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体系的反应；第三，政治与经济不可分割的原则。综合这些因素与原则，庞中英从中国对国际环境的应对的角度把这六十年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1949 年—1970 年代末

第二期：1980 年代—冷战结束

第三期：1990 年代后半期—后冷战期

第一期换言之就是国际冷战时期，也是毛泽东时期。中国外交的主要内容是在敌对性的国际环境下进行自我防御，是对美国等国“遏制中国”的反应。第二时期的中国外交是在独立自主政策下为经济利益服务，是第一时期外交的根本转换。到了第三期，经济、政治全球化进程迅速，中国外交完全以确保自身利益为目标。^①

另一种方法是以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态度的变化来进行时期区分。研究中国对国际机构，即既存的国际体系的态度与立场的金淳基（Samuel Kim）认为，中国在 1950 年代采取了反国际体系的态度与立场，1960 年代采取的是变更国际体系（或另建别的国际体系）的态度与立场，1970 年代采取的是有选择地变更国际体系的态度与立场，1980 年代则采取了维持与活用国际体系的态度与立场。^② 如果按照这个时期区分法，或许可以认为，1990 年代后半期以来中国采取的是慎重地“建立新国际体系的态度与立场”。换言之，这种变化意味着中国对既存的世界体系的关注与认识已经经过马克思主义、从属论、新现实主义过渡到了“利益引导下的新机能主义”。

表一是以决定中国外交的最主要因素、中国的战略、中国对既存的国际体系的态度与立场、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关注与认识四点为主线对近六十年中国外交的变化进行的区分。从表中可以明确看出，中国

① 庞中英：《半个世纪的中国外交》，《国际经济评论》1998 年第 5、6 期。

② Samuel Kim, "China'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al Behaviour,"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外交每十年都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决定中国外交的最主要因素在 80 年代由国际环境转变为了国内压力，与之相对应，中国对国际体系的态度与立场、关注与认识也发生了转折。

在进行时期区分时必须指出的是，外交与内政的关联在毛泽东时代的三十年与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时期及后邓小平时期）有着本质不同。换句话说，就是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不同。笔者的观点是，在前三十年，国际环境，或者说领导（毛泽东）对国际环境的认识作为一种既成事实支配了内政。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激烈的权力斗争和经济破产损害了正统性，到了后三十年，国内压力（安定、开放、发展）就成了决定中国对外关系的最主要因素。极而言之，在毛泽东时代，无论是反“右派”运动还是“大跃进”运动，都是领导（毛泽东）对来自外部的危机的应对，“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对苏联修正主义这一外部敌人（同时又是内部敌人）的反攻斗争。

另外，区分这些时期的重要事项是：1. 1950 年代末开始的中苏对立；2. 1960 年代末开始的中美接近；3. 1970 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的转折；4. 1992 年开始的经济市场化的加速；5. 2001 年开始的以加入 WTO 为象征的中国自身的全球化进程。换言之，把握了这五大重要事项，就容易理解中国外交六十年的历史。

表一 现代中国外交六十年的变化

	决定中国外交的最主要因素	中国的战略	对国际体系的态度与立场	对国际体系的关注与认识
1950 年代	国际政治环境	对苏“一边倒”	变更国际体系	马克思主义
1960 年代	国际政治环境	反美、反苏 二条线	变更国际体系、 反国际体系	从属论
1970 年代	国际政治环境	反苏一条线	选择性地变更 国际体系	新现实主义

续表

	决定中国外交的最主要因素	中国的战略	对国际体系的态度与立场	对国际体系的关注与认识
1980 年代	国内压力 (经济成长)	独立自主	维持与活用 国际体系	新现实主义
1990 年代	国内压力 (经济成长)	韬光养晦	维持与活用 国际体系	新机能主义
2000 年代—	国内压力 (成长) 国际环境 (安定)	伙伴关系	摸索建立 新国际体系	新机能主义

二、现代中国外交——三大疑问

从长时段看中国外交时，首先浮现在脑海的疑问就是：近代以前的传统的中华秩序到底是个什么秩序？这个秩序观在现代中国外交是否依旧存在？精通民族问题的费孝通用“差序”一词来表述传统的中华秩序。传统中国一贯的对外认识和对外行动是，在一个同心圆上，依中心、周边及其外延上的异国向外延伸的，同时也是阶层式的对外认识和对外行动。那么，这种对外认识和对外行动现在是否仍然存在？或者与之完全不同，现代中国的外交是忠实于近代主权国家体系和国与国之间平等的理念，以国家主权为基本来维持生存并扩大影响力和力量的外交？抑或两者都不是，是处于两者之间？要回答这个问题非常麻烦。笔者的暂时性的回答是，贯穿现代中国外交的是主权国家第一的近代主义。

第二大问题是，贯穿现代中国外交的是基于利益或势力的现实主义还是基于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等的理想主义？这个问题也是分析美国外交时经常提到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笔者的暂定性回答是，中国外交的基本是现实主义，但是根据情况和目标有时会加上理想主义、道德主义等“价值”。冷战时期，身处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不是追求自己一个国家的利益，而是标榜“国际主义”。但是这个国际主义是极有特征的。日本最著名的中国外交研究专家冈部达味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念的国际主义称为“Ⅰ型国际主义”，斯大林时代以来的苏联的

阵营论和社会主义共同体论（勃列日涅夫理论）称为“Ⅱ型国际主义”，认为国民国家体系和国际主义团结能够两立的中国式国际主义称为“Ⅲ型国际主义”，并分析了三者间的原则上的和历史性的不同（冈部达味，1975年）。后面还要谈到，中国的国际主义与其说是以东西为轴，还不如说是以南北为轴的南北问题中“南”方的“国际主义”。

第三大问题是，是否存在中国式的，或者中国固有的对外认识的方式与结构。笔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是的。中国极为多层次地认识外部世界。领导人和国际政治学者首先考虑的是世界体系（第一层次），其次考虑的是“时代性”，如冷战时代、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的区别（第二层次）。第三层次是国际政治结构与体系。世界是两极还是多极的议论属于这个层次。中文用“系统”这个用语来表现。第四个层次是用“格局”这个用语来表现的狭义的国际体系，极端地说，就是大国间的势力均衡。

笔者认为，中国的外交思想（对国际关系和外交的认识框架）就是这四个层次，但是，这四个层次在不同的时代会发生变形并出现不同的组合。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要点是中国对自我作用的认识。无论是在美国外交中还是在中国外交中，如何认识自身的作用是外交上的重要因素，日本外交则基本缺乏这一点。因此，日本外交与中国外交、美国外交有着本质性不同的地方。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如何认识自己的作用，“我们在世界上处于什么位置和立场？应该做什么？”的问与答，哪怕是不充分，抑或是问答错误，但一直存在于中国外交的根底。^①

三、从有关中苏同盟关系的新资料能看出什么？

1. 主要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十来年，有关中苏关系的第一级的资料第一次大批公开。其中的许多资料我们可以通过英文阅读到，通过沈志华教授等的努力，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用中文也能阅读到。如果再加上中国公开的第二次、第三次史料，我们能够搞清楚下列50年

^① 关于这一点，具体可参见毛里和子《以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外交、外交思想为中心（改革开放時代の中国外交—外交思想を中心に）》，冈部达味编《大中国的政治变容（グレート・チャイナの政治変容）》，东京：劲草书房，1995年，第121—149页。